

# 集安国内城东、南城垣考古清理收获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sup>1</sup>

集安市博物馆<sup>2</sup>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春, 130033; 2. 集安市博物馆, 集安, 134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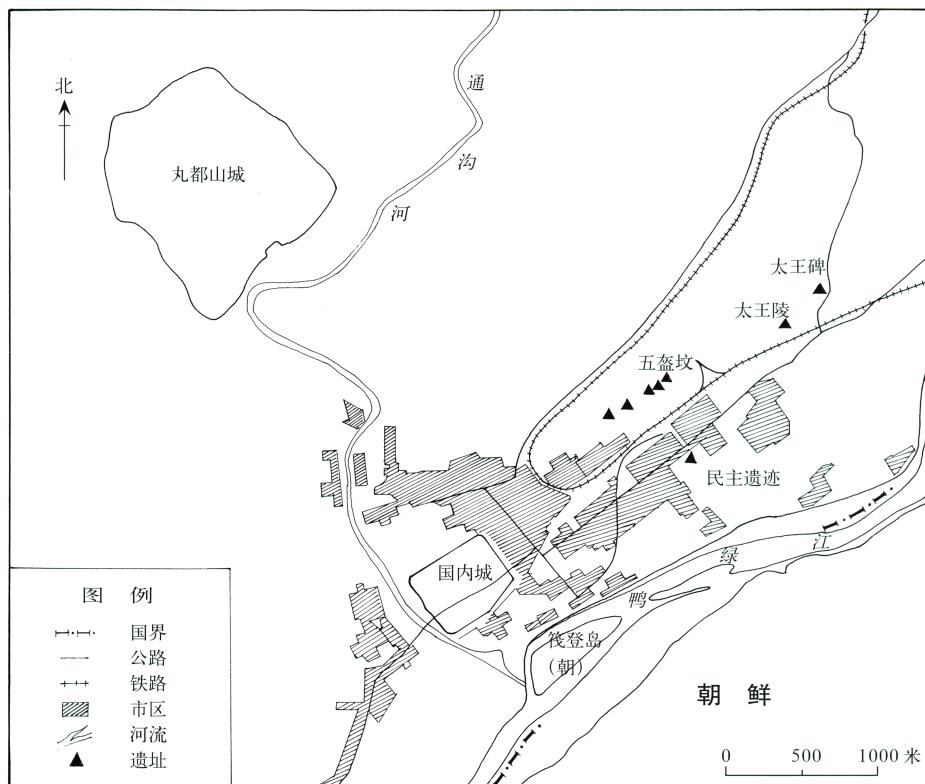
**摘要:** 2009、2011年,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配合本体保护工程对国内城东、南城垣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对城垣轮廓的清理和城墙解剖, 获得了有关国内城始建年代、城垣结构、城址总体形制全新的学术认识。本文即结合以往国内城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 将此次国内城东、南城垣发掘所获的学术认识公布于学界, 望学界同仁斧正。

**关键词:** 集安; 国内城; 城垣

**中图分类号:** K878.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1. 王志刚 (1979-), 男, 满族,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2. 郭建刚 (1980-), 男, 汉族, 集安市博物馆馆员; 3. 张哲 (1975-), 男, 汉族,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国内城”一词始见于《周书·高丽传》, “治平壤城, ……其外有国内城及汉城, 亦别都也。”<sup>[1]</sup>在杜佑《通典》中, 记载了国内城的地理位置: “马訾水, 一名鸭绿水, 源出东北靺鞨白山, ……去辽东五百里, 经国内城南……”<sup>[2]</sup>。目前高句丽考古、历史学界的倾向性认识是, 位于集安市区内的石城即为高句丽国内城(图一)。



图一 国内城地理位置图

(引自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第6页, 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国内城城垣的考古工作起步时间很早，早在 1914 年日本《考古学杂志》发表的关野贞论文中，即公布了日本人吉井文学士绘制的国内城城垣平面示意图，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国内城城垣轮廓图<sup>[3]</sup>。

在 1938 年出版的《通沟》考古报告中，首次发表了国内城城垣平面实测图，图中国内城的城垣轮廓已较 1914 年版国内城城垣平面示意图有了较大变化，城墙外侧标注的马面数量大幅减少<sup>[4]</sup>。

我国学者对国内城城垣的考古工作主要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第一次重要的考古工作是 1975—1977 年集安县文保所对国内城城垣的解剖。在发表于《文物》1984 年 1 期的考古报告中，公布了 1980 年测绘所得的国内城城垣轮廓图。发掘报告依据对国内城城垣的解剖结果，首次提出了国内城石筑城垣下存在年代可早至高句丽建国前的汉代土城，成为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城年代研究的主要考古学依据<sup>[5]</sup>。

2003 年，依照国内城本体保护方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国内城的西墙和北墙进行考古清理，基本确认了西墙和北墙的城垣走向<sup>[6]</sup>。

2006 年，国内城南城垣本体保护工程作为集安高句丽后续保护项目之一正式立项。

2007 年，为配合国内城南城垣本体保护工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对国内城南墙进行了考古清理，在南墙中部城垣外侧清理马面 3 个<sup>[7]</sup>。

2009年，国内城南城垣本体保护工程正式启动，在墙体维修过程中，相继在南墙中部、东墙南端发现马面2个，在城址东南角发现角楼1个。集安市博物馆对遗迹进行初步清理后，发现遗迹情况较为复杂，遂报请吉林省文物局，委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迹进行进一步清理。在对已发现遗迹的清理过程中，发掘者意识到南墙外侧可能还残存有更多的高句丽时期遗迹，为对国内城南墙外侧现存的遗迹现象进行完整清理，同时也保证本体保护工程的顺利有序进行。在对已发现遗迹清理的同时，在南墙外侧，按南墙走向，布1米宽探沟1条，进行试掘。除已发现的2处马面外，又在南墙的西部和东部，相继发现并清理马面4个，在南墙中东部东盛街口处清理门址1处，并对东墙南段保存较好的长约65米东墙外侧墙面砌石、国内城城垣东南角的内侧部分进行了考古清理，又对东墙南段的1个地点进行了局部解剖。2009年度的发掘，共清理马面6个，门址1处，角楼1个，对国内城东、南墙的城垣走向、墙体宽度、起建层位、始建年代、建筑方式、墙体的增补维修情况、马面和角楼的构筑方式等方面均得到了考古学认证。在2003年国内城平面实测图的基础上，通过考古实测，补充了国内城南墙和东墙南段城垣的位置和走向，测得南墙的长度为759.78米<sup>[8]</sup>。

通过2009年度的清理，对于国内城始建年代、城墙结构、构筑方式等问题，得出了与以往考古工作完全不同的学术认识。为进一步认证2009年清理所获学术认识，完整国内城城垣的平面轮廓，2011年6—9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对国内城东墙北段，2010年现代建筑拆迁完毕后的区段进行了主动性考古清理。2011年度的清理，北起2003年清理的国内城东北角东墙南侧，南至团结路北现存的两栋现代建筑北端，共清理东墙城垣外侧墙面砌石长约85米，新发现并清理马面2个，并对墙体的2个地点进行了解剖。通过清理，确认了这一区段东墙的城垣轮廓、墙体的建筑结构和始建年代。

## 二

2009、2011年度清理的马面和角楼，总体结构和构筑方式相近，均以形体较大、大致修理呈长方体的块石垒砌外缘，内部或以梭形石、不规则形块石填充，石间粗砂勾缝；或以河卵石混合青黄色沙土填筑。

马面平面均呈横向长方形轮廓，南北长5—5.5米，东西宽9—10.5米左右，多数马面仅存基部，现存砌石1—3层，残高0.5米左右，局部保存较好处存外缘砌石5—7层，高度可达1.5米以上。

角楼亦仅存基部，在城址东北角外侧以巨石垒砌外框，内部河沙掺河卵石填充而成，平面近方形，边长12—12.3米，局部保存外框砌石2层，残高1.5左右。

马面和角楼因其内部结构和与城墙连接方式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如东墙1号、东墙2号马面，与以往国内城发现的马面相同，外框内部以梭形石或不规则形块石垒砌，马面内部填石与墙体内部填石相互咬合，一体构筑而成；马面外框砌石与墙面砌石间也呈错位咬合的形态。第二类如东南角楼和南墙1号马面，外框内部以河卵石和河沙混合填充，且马面和角楼与城墙主体部分间有一道隔墙分隔。

通过对东南角楼的解剖，发现分隔角楼主体与其内侧墙体间的隔墙向下延伸至角楼的基底，且隔墙的用材特点、起建层位和构筑方式与角楼西侧的南墙完全相同，位置也相对应。而角楼外框砌石也没有与南墙墙面砌石呈现交错咬合的形态，而是从外侧顶至南墙墙面之上，东南角楼实为在原有城墙墙体转角之外补砌而成，建筑年代晚于其内侧的城墙。对南墙1号马面的清理结果与东南角楼相似，马面主体亦叠压其内侧的城墙，马面与墙体间齐整的隔墙实为建筑年代早于马面的城墙墙面砌石。

2009年对南墙中部东盛街口处墙体的清理确认了一处高句丽时期门址。经清理，此门址结构与2003年清理的北墙中门和北墙西门相同，即为门址外侧东、西各置一马面，马面内侧为横断墙体形成的两座门墩，门墩间为门道的形制。遗憾的是，发掘确认的两个时期的门墩外框砌石均叠压于门址西侧马面残基之上，建筑年代晚于门址西侧马面，应为门址损坏后补筑而成。由于未能发现明确确认现存门墩外框砌石年代的遗物，现存门墩的建筑年代尚难确定。

### 三

对城墙的清理和解剖，是此次发掘中较为重要的发现。

对南墙的清理，在南墙2号马面周边，发现了起建层位不同，砌石形制有别的三类墙体外侧墙面砌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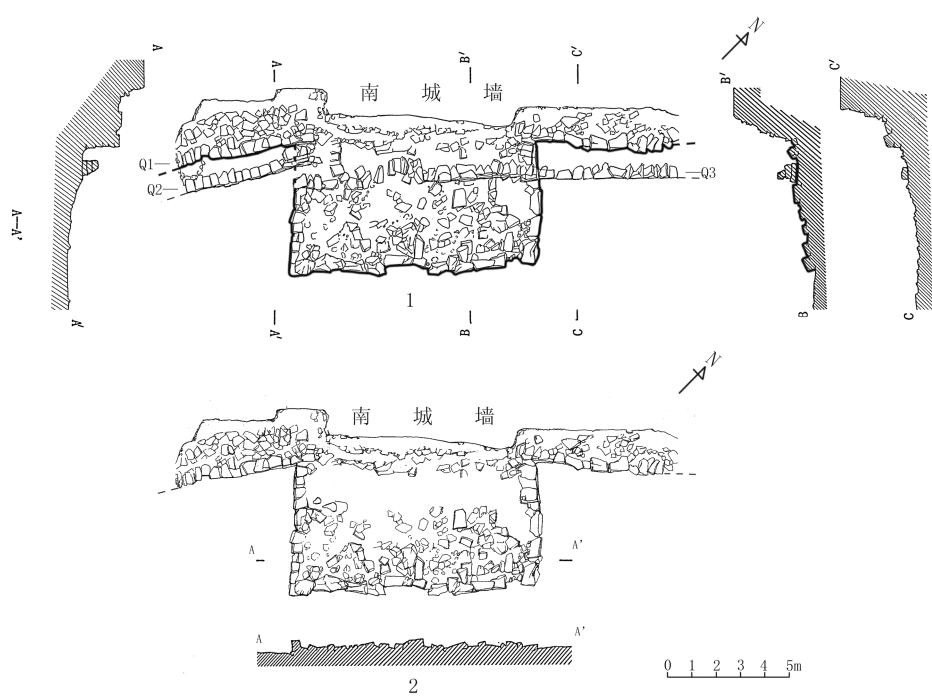
第一类墙面砌石起建于青黄色沙层上，以形状不甚规整的块石垒砌，墙面由下至上略呈斜坡面内收，现多残存砌石1—3层，与马面连接处局部现存砌石11层。此种形制的墙面砌石均直接与马面外框砌石相连接，二者一体构筑而成，应与马面为同时期遗迹。

第二类墙面砌石以修琢规整的楔形石垒砌，墙面由下至上逐层内收，此类墙面砌石在南墙2号马面西侧从外侧将第一类墙面砌石包裹，两层墙面砌石间以黄色粘土掺少量碎石夯实，墙体东端顶置南墙2号马面西侧外框砌石外侧，未与马面残基发生叠压关系。

第三类墙面砌石用石杂乱，使用楔形石和不规则形块石混筑，起建于黑土层上，在马面东侧砌筑于第一类墙面砌石外侧，墙体西端直接叠压于南墙2号马面残基之上。

这三类墙面砌石中，城垣东南角内侧的第一类墙面砌石下叠压火候较高、器表见轮痕的泥质红褐陶筒瓦，凸面排印方格纹和席纹的板瓦残片。在集安地区其它高句丽时期遗址中多见，为典型的高句丽时期遗物，且年代恐不早于公元3—4世纪。第二类墙面砌石外侧封护的黄色粘土层中出土典型的高句丽时期铁镞，未见其它遗物，其年代亦为高句丽时期。第三类墙面砌石中未见遗物，但此类墙体用石杂乱，均叠压于马面、角楼残基之上，在西墙北段、北墙局部、东墙南段、南墙普遍可见此道墙面砌石，可能为民国时期维修国内城时形成（图二）。





图二 南墙二号马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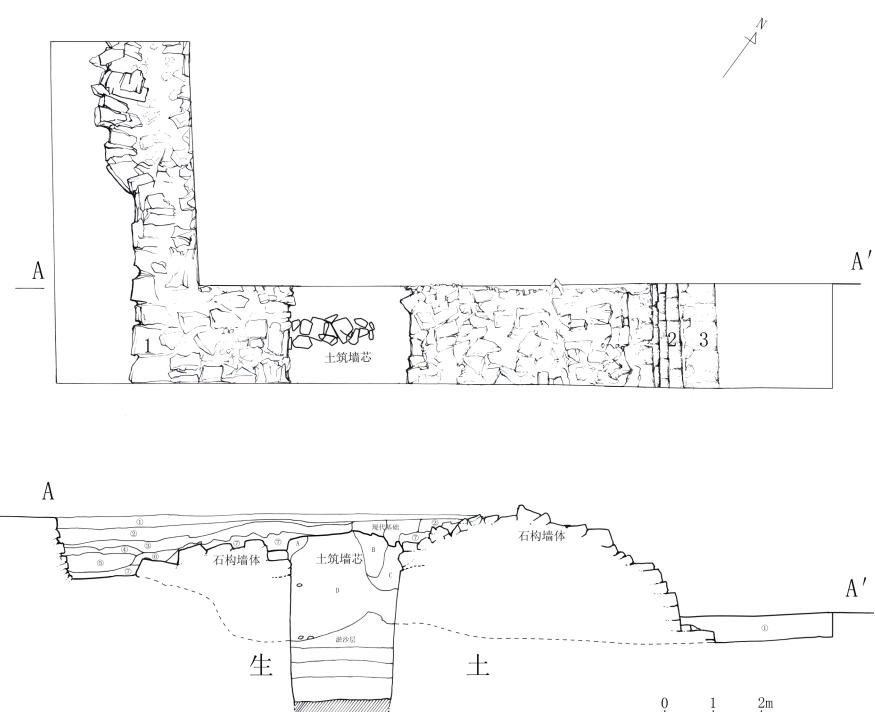
1、马面及周边三道墙面砌石层位关系平剖面图 2、马面平剖面图

2009、2011 年度，对东墙 3 个地点进行了解剖。

2009 年对东墙墙体的解剖，首先认定了东墙内侧的墙面砌石，仅存石一层，应为东墙内侧墙面的基础石，据此确认这一位置的东墙基部宽 11.3 米。对东墙的解剖过程中，清理至现存墙体顶部时发现，墙体的内外侧为石砌，墙体的中部存在土筑部分。出于对墙体的保护，对墙体的石砌部分并未向下清理，仅将墙体的土筑部分做了解剖。解剖发现：土筑部分的内外两侧东墙上部的砌石只残存有 2—3 层，石下仍为沙土。土筑部分虽然可分为 4 个部分，但填土质地疏松，不见夯层和夯筑痕迹，出土有较多的碎陶片，从顶部至底不见分层，出土陶片没有变化，应该是一次性堆筑而成。通过上述结构特点，大致可以确认，此区段的东墙为中部沙土堆筑，内外两侧和上部石筑，最终于墙体内外缘以墙面砌石包裹的构筑方式（图三）。

2009 年对东墙的解剖，在墙体中部土筑部分中发现的陶片除极少量为手制外，绝大多数器表见明显的轮痕，且火候很高，陶质坚硬。口沿多侈口、方唇或圆唇，多见横耳器。部分出土陶器的器形、纹饰特点，与五女山城 4 期文化遗存<sup>[9]</sup>、集安东台子建筑址<sup>[10]</sup>、2003 年国内城体育场地点 4 层下开口的 7 座灰坑<sup>[11]</sup>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年代亦相当，上限应不早于 4 世纪初前后。

2011 年对东墙北段 2 个地点的解剖，第 1 地点同时确认了东墙的内、外侧墙面砌石，可确认墙体基宽 11.3 米。第 2 地点解剖确认的墙体结构与第 1 地点相同，均确认此区段的东墙为墙体中央夯土夯筑，夯土内外两侧土石混筑，再于墙体外侧以梭形石干插垒砌，最后在墙体内外侧面包砌墙面砌石的结构方式。两条解剖沟中，都发现了墙体中部夯土部分与两侧土石混筑部分夯层交错叠压的迹象，进而证明墙体最中心的夯土部分，与其外侧土石混筑的部分为一体构筑而成。



图三 09JGDT1平面及北壁剖面图  
 1、东墙内侧墙面砌石 2、东墙外侧墙面砌石 3、东墙外侧墙下基础

可能考虑到墙体外侧的牢固性，仅在墙体外侧一面，以梭形石干插增强坚固性。2011 年对东墙北段解剖出土的遗物特点，也与 2009 年解剖出土的遗物相似，年代接近。

通过对国内城东墙墙体的解剖，可确认，上述解剖点的国内城东墙，石筑墙体内部的土筑部分实为石筑城垣的内部土芯，而非年代早于石墙的土筑城墙。而通过夯土墙芯内出土遗物的初步研究，3 处解剖地点的国内城城垣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公元 4 世纪初前后。

## 四

21 世纪以前对国内城城垣的考古工作，多仅限于局部的清理和发掘，对国内城城垣的形制、布局缺乏全面认识。2003 年配和国内城本体保护工程，对国内城西墙、北墙进行了清理，基本上通过考古学手段，确认了西墙、北墙的城垣走向、马面、门址等遗迹的分布情况。近年对国内城东、南墙垣的考古工作，除东墙中部现代建筑密集区短期难以恢复城墙原貌外，基本上确认了国内城东、南墙的高句丽时期墙垣走向和建筑遗迹分布情况，在 2003 年基础上，补充完整了国内城城垣的平面轮廓。

通过对东、南墙的清理，大致在城墙外侧以 40—60 米间距设有马面遗迹，以此间距，1914 年版国内城城垣平面示意图标注的马面数量似乎较为可信。而 2009 年清理的南墙门址位置、2003 年清理的西墙南门位置，亦与 1914 年版国内城平面示意图标注的情况相符。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在日后对国内城城垣的研究中，要充分引起对 1914 年版国内城平面示意图重要性的认识。

2009 年对国内城南墙的清理，在南墙发现了起建层位不同、用石及墙体形制有别的 3 道墙面砌石间直接的层位关系，为研究国内城其它区段，不同建筑结构墙体间的相对年代提供了考古层位学依据。对南墙 1 号马面、城址东南角楼的清理，发现二者内部结构与多数马面不同，进而通过进一步的解剖，确认二者与城墙分筑而成，与城墙间存在建筑年代的早晚关系。2003 年清理的国内城西南角楼内部结构与东南角楼相同，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些新发现，都为进一步研究国内城城址的使用和沿用年代、城市沿革和城垣修缮维修等问题，提供了考古学实证依据。

对东墙的解剖，是国内城东、南城垣清理最重要的收获。3 个地点的解剖得出了对国内城城垣结构和始建年代基本相同的学术认识。这一认识与 1975—1977 年集安文保所对国内城城墙解剖所得的学术认识有较大差异。

1975—1977 年的发掘认为，国内城石筑城垣下存在建筑年代早于高句丽建

国前的土城垣。进而结合《三国史记》中琉璃明王二十二年“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sup>[12]</sup>的记载，解释迁都于国内，不筑国内城去筑尉那岩城，就意味着当时国内已经有了城垣，提出了国内城石墙下存在汉代土城。就此引发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内城始建年代问题的学术争论。

其实李健才先生早在1993年发表的《高句丽的都城与疆域》一文，即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李健才先生认为：“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尉那岩以前，只有国内和尉那岩的地名，而无城名的出现；从考古资料看，虽在集安县城石墙下发现土墙，但这是汉代土城，还是国内城石墙内的墙基，还有待商讨和研究。”<sup>[13]</sup>

近年对高句丽都城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对国内城的始建年代提出了新的观点。李新全先生在其博士论文《高句丽早期遗存及其起源研究》中，就通过陶器的类型学研究，提出1975—1977年，集安文保所对国内城城墙解剖中，土筑部分内出土的部分陶器年代可晚至3世纪末—4世纪初<sup>[14]</sup>。

金旭东先生在其博士论文《西流松花江、鸭绿江流域两汉时期考古学遗存研究》中，更是根据近年来对国内城东、南城垣考古清理的新成果，提出国内城的始建年代为公元342年<sup>[15]</sup>。

对国内城东墙的解剖，认证了上述学术认识。国内城石墙下发现的土筑部分，并非年代早于石墙的土筑城墙，而是石墙内部的土筑墙芯。并且，基于目前高句丽陶器分期研究成果，土筑墙芯内出土陶片的年代应不早于公元4世纪初前后。

**执笔：王志刚 郭建刚 张哲**

## 参考文献

- [1] (北齐) 魏收. 周书·高丽传[M]. 中华书局, 1975.
- [2] (唐) 杜佑. 通典[M]. 商务印书馆, 1935.
- [3] 【日】关野贞. 满洲辑安县及び平壤附近に於ける高句丽时代的遗迹[J]. 考古学杂志, 第五卷第三号, 聚精堂, 1914.
- [4] 【日】池内宏. 通沟(上)[M]. 【日】“日满文化协会”, 1938.
- [5]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 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J]. 文物, 1984(1).
- [6]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市博物馆编著. 国内城——2000~2003年集安国内城与民主遗址试掘报告[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年.
- [7]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资料.
- [8] 中国文物报社编. 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09[Z]:58—59, 2009年中国文化遗产增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五女山城——1996~1999、2003年桓仁五女山城调查发掘报告[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10]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J]. 考古, 1961(1).
- [11] 同[6].
- [12] 【高丽】金富轼著, 孙文范等校勘. 三国史记(校勘本)[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 [13] 李建才. 高句丽的都城和疆域[A].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C]. 1991(1-2).
- [14] 李新全. 高句丽早期遗存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15] 金旭东. 西流松花江、鸭绿江流域两汉时期考古学遗存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年.

## **surrounding Guonei City in Ji-an**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rchaeology<sup>1</sup>;  
Ji-an Museum<sup>2</sup>

(1.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rchaeology,ChangChun,130033;  
Ji-an Museum, Ji-an 134200)

**Abstract:**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wall of guonei city were excavated by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rchaeology and Ji-an museum attached to the protection works of the complex of guonei city site in 2009 and 2011. Absolutely new academic knowledge about the initial year , the structure of the wall and the whole form system of guonei city are obtained through their archaeological work. And this article will show them to all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combined with previou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academ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Correct comments from academic colleagues are needed.

**Keywords:** Ji-an;Guonei City;Walls